

# 法律视角下 的埃及经济改革模式

范 纯

**内容提要** 近年来,埃及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埃及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一场制度变革,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改革。埃及宪法的修改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作为结构改革的法律依据,1991年埃及新国有企业法始终起到引导作用;新投资法的制定为培育出口产业奠定了法制基础;金融制度改革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自由贸易协定带来出口增加效应。总的来说,埃及的渐进改革方式、依法推进改革、注重形成改革的激励机制等做法值得有关发展中国家借鉴。

**关键词** 埃及 改革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结构改革

**作者简介** 范纯,法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近年来,埃及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受到许多国家关注。世界银行将埃及经济改革作为一种模式,希望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埃及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一场制度变革,由来已久。本文从法律视角解析埃及经济改革,并尝试总结出可资借鉴之处。

## 埃及模式的提出

2004年7月埃及纳齐夫政府成立以来,全力推进经济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埃及国内生产总值2006~2007财政年度增长率首次超过7%,预计2007~2008财政年度将达7.3%。<sup>1</sup>埃及在2007~2012年的五年计划中,将年均经济增长率定为8%,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未来五年翻一番,2020年要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成为非洲“经济之虎”。2007年11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埃及经济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埃及经济改革模式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sup>④</sup>世行还把埃及视为2007年度全球“最佳改革国”之一。

事实上,埃及经济改革由来已久。1974年埃及就提出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实现国外资本、技术与国内劳动力相结合,力求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改革的依据与手段,1974年埃及制定了第43号法律,即促进资本引入和资本积累的投资法。该法规定,依据本法设立的企业,无论国外资本还是国内资本,均为私有企业,不实行国有化。但实际上,国外资本只投向石油等一部分产业,制造业投资几乎均源于国内资本。也就是说,埃及实行的开放政策在提升国企效率方面取得的成效并不显著。埃及为吸引直接投资,1977年制定了第32号法律,为外资提供税收、人力资源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但效果仍然欠佳。埃及以国企保护、价格统制、出口限制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依然存在,未能保证经济自由

<sup>1</sup> 朱国才:《2007回顾并展望各国经济》, [http://www.gxi.gov.cn/jjxx/jjxx\\_jjxx\\_jjxx\\_yxw/jjxx\\_jjxx\\_yxzk\\_gj/200712/t20071229\\_25415.htm](http://www.gxi.gov.cn/jjxx/jjxx_jjxx_jjxx_yxw/jjxx_jjxx_yxzk_gj/200712/t20071229_25415.htm), 2008年2月2日。

<sup>④</sup> 参见郭春菊、余忠稳:《世行行长表示埃及经济改革模式可资借鉴》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ggjj/20071116/11084183099.shtml> 2008年2月4日。

活动的充分开展。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埃及外汇收入因石油价格下跌和偿还外债而逐渐减少。1986 年,埃及国际收支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4%,为此,埃及提出第二次经济改革,其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改善国际收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削减财政赤字、纠正能源价格、激发民间活力等。为弥补资金不足,1987 年,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备用贷款协议。后者提出的贷款条件是埃镑贬值、提高实际利率、废除进口数量限制、削减补助金等。因埃及政府只实施了上述部分内容而使协议成为废案,埃及未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20 世纪 90 年代初,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签署了经济结构改革协议,全面推行经济改革。伴随着上述协议的实施,90 年代中期埃及宏观经济状况迅速改善。由此,在 90 年代后期,埃及推进了民营化改革。但是,2000~2001 财政年度以后,受九一一事件影响,到埃及观光的游客减少,加之石油价格下跌,埃及外汇收入下滑,经济增长减速。经济状况的恶化造成外来直接投资减少,外债增加。2003 年 1 月,埃及向浮动汇率制过渡,在经济发展减速过程中,埃镑贬值,通胀率上升。最终,经济停滞,并使埃及经济改革受挫。

2004 年 7 月 10 日,纳齐夫政府开始理政,提出扩大投资和就业、改革补助金制度,控制物价水平、激发经济活力等政策目标。新政府为促进投资,简化投资程序,制定明确规则,减轻投资成本负担,促动民间部门参与公共投资项目,鼓励出口,推进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为确保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埃及政府对面包等基本食品继续实行补贴,实行有效率的补助金分配,同时,改革基本生活用品的生产、流通体制,增加商业信用,提供商业信息。为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埃及政府也实施一些新举措,如削减关税税率;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法人税率;对银行部门实行全面改革;改善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环境。

从上述举措看,纳齐夫政府主要靠激发民间活力来推动经济增长,即通过扩大民间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为此,完善民间投

资环境成为纳齐夫政府的优先事项,重点是提供投资机会;简化繁杂的裁量性制度;减少交易费用。另外,新政府继续维持面包等基本生活品的补助金制度,以维护社会稳定。同时,政府通过改革流通体制,纠正价格的扭曲,减轻财政负担。我们可以从纳齐夫政府的经济政策透视其经济改革的核心,即针对埃及实际情况将市场原理贯彻于经济运行机制,形成以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三年来,纳齐夫政府通过税制改革、补助金制度改革、银行部门改革、民营化改革等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目的。

总体来看,埃及经济改革方式是渐进的,改革内容分为体制改革和结构改革两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由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资源能有效配置的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基础制度包括产权私有、自由交易制度等。运行机制主要指市场供求调节和宏观调控。经济结构改革就是要改变脆弱的产业结构,培育出口产业;降低公共部门比重,实现民营化;改善国际收支,实现贸易平衡。如果说埃及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应归功于埃及历届政府多年来对改革的不断探索,以及阶段性制度改革成果,纳齐夫政府主要是在原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推进了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的进程。

## 关于埃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法律解析

实际上,埃及经济改革的实质是一场制度变革。在此过程中,埃及有效地运用法律工具性作用,发挥了法律对经济改革的引导作用、促进作用和保障作用。从经济改革的历程看,我们认为,前两次经济改革主要是改善国际收支和激发民间活力,扭转对外经济失衡状态,而未充分考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改革。<sup>1</sup>而本次改革,则是在多年制度变革基础上的新一轮改革。纳齐夫政府的贡献在于,优先建构保障经济高效运行的制度框架,即通过创新法律制度,推动埃

<sup>1</sup> 参见 [日本] 土屋一樹:《エジプトの民営化政策の变化》(《埃及民营化激励机制的变革》),载《現代の中東》(《现代中东》) 2002 年总第 32 期,第 4 页。

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法律本质是一种权利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实体经济,必须先有市场主体存在,而这必须赋予市场主体以权利。市场主体对交换的产品应享有所有权和交易权。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形式,就是通过权利这一中介而进行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先进的资源配置形式,就在于它对权利的配置,只有将权利配置适当,才可能有效地配置好资源。<sup>1</sup> 物权制度在市场经济社会通过规范财产的占有和支配关系,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同时,物权法对所有权及其他物权的设定、取得及保护等规定,为交易的正常进行确立了最基本的行为规则。债权制度通过确认并规范财产交换或转移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强制力保证债权人的期待利益不致落空,以实现自己应得利益。因此,规定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的民法一直在商品社会中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纳齐夫政府经济改革的原有制度基础,埃及民法始终起到应有效用。埃及现行民法典是1948年制定、1949年开始实施的。它吸收了埃及法庭的判例,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现代民法典,既有西方法的内容,也有伊斯兰教法的内容。这样的一部民法典在纳赛尔体制下奇妙地保留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有人提出一项提案,即民法规定的内容不明确时,则适用社会主义体制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该提案没有实现,没有实行涉及修改民法典基本原则那样的根本性改正。<sup>④</sup> 也就是说,在埃及近代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法典,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悄然地起到应有作用。埃及于1999年5月颁布新商法典,增加了银行交易、商业代理、技术转让合同等规定。它也对工业设计与商标保护、商号、商业票据和破产等作了相应规定。<sup>④</sup> 从民商立法体现地位平等、权利本位、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来看,它们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尤其是民法中的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集中体现了当代埃及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法权要求,构成埃及经济体制的法律基础。

此外,20世纪90年代,埃及确立的涉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各项经济法规仍在持续起作用。在

农业生产方面,埃及1992年发布第96号法律,变革土地制度和雇农制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它要求首先分阶段提高雇农费用的上限,1997年以后实行自由化。更新雇农契约期间为12个月,赋予土地所有者终止契约的权利。由此,雇农制度引入市场原理,<sup>1/4</sup> 雇农制度的改革构成农业增收的激励机制。在资本市场方面,埃及1992年发布第95号法律(即资本市场法),强化了证券监督机构的作用,规定了上市企业基于国际会计标准公开季度报告的义务,增加了海外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权利保护。该法完善了资本市场法制环境,继而,证券公司数量从1993~1994年的48家增加到1995~1996年的150家以上,股票交易额也有所增加。在劳动关系方面,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埃及2003年4月颁布了新的劳动法,调整雇主和雇员的关系,给予雇主解聘雇员的权利,也规定了很多保护雇员权利的条款,如最低工资标准的确立、增加职工假期等,使劳动关系向市场化发展。

良好的法律秩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市场经济本身不具备维持正当竞争的机制,有些经济主体会不择手段地夺取竞争优势,侵犯他人利益,扰乱经济秩序。为此,2003年埃及通过了竞争与反垄断法,旨在保护埃及投资秩序,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2005年,纳齐夫总理签发第3号法令,即《保护竞争和反垄断法的实施条例》。该条例将自然人对某个市场的占有比例份额提高至25%,同时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左右某类市场的商品价格或控制商品市场供应量,禁止任何组织、团体之间签订任何协议,以地理区域划分市场,控制某类商品市场价格。这种符合埃及国情的法律调整与补充,较

<sup>1</sup> 参见邱本:《短缺权利的经济》,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第13页。

<sup>④</sup> 参见[日本]两角吉晃:《民法典小史》(《埃及民法典小史》),载《东京大学法科大学院——》(《东京大学法科研究生院法律评论》)2007年9月,第162页。

<sup>④</sup> 参见何勤华、洪永红著:《非洲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页。

<sup>1/4</sup> 参见[日本]土屋一樹:《農業開発政策と農業生産の推移》(《埃及农业开发政策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载《現代の中東》(《现代中东》),2003年总第34期,第30页。

好地维护了市场秩序。

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调整税收政策,使其微观经济行为尽可能符合国家预期的经济发展方向。2004年9月,埃及新政府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改革方案。新所得税法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提高最低课税所得额等措施,实现了大幅减税。在法人税方面,埃及将标准税率由40%减至20%,同时简化了纳税手续,并通过明确规则和变更会计检查方法等,改善了繁杂、模糊的纳税程序。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促进了埃及宏观经济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宪法的修改对经济体制起到了保障作用。埃及宪法是1971年制定、1980年修改补充、经国民投票认可而实施的。1971年宪法设立了“法治”规定,强调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明确规定了司法独立与司法特权。“法治”规定中虽然也有威胁司法独立的条款,但实际上,“法治”未停留在抽象性规定上,证明法官独立的事例和法庭对政治事件裁决的事例不断出现、不断增加,呈现出遵循“法治”的倾向。1980年埃及修改宪法,将国家的基本体制定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在经济领域,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融合进自由经济的新要素。更重要的是,2006年12月,穆巴拉克总统提出宪法改革,以义务和权利平等为基础,强调市民权和自由价值。在埃及经济制度方面,宪法未做强制性规定。因此,即使埃及改变经济运行方式,也未必要修宪,国家可自由选择经济制度。<sup>①</sup>2007年3月埃及实行国民投票,75.9%的选票赞成修改宪法。可以说,埃及的修宪活动能够保障推进埃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

## 关于埃及经济结构改革的法律解析

从埃及经济结构改革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企业所有制改革、金融结构改革、扩大出口贸易改革。企业改革主要是国有企业以股份制为中心的民营化改革,以及建立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金融改革有利率制度的调整、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转换、规范证券公司交易行为、改革保险公司体制等;扩大出口贸易主要是通过建立经济特

区,培育出口产业,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出口市场,谋取贸易最大化利益。

在国企改革方面,埃及通过制定专门法引导改革。1991年,埃及公布第203号法律(即新国有企业法),指定314家国企脱离政府管辖,集结在17家持股公司名下,按市场机制运作。该法规定的民营化主要手段有:公开发行人股、企业出售给战略投资家和企业职工、变卖企业资产、实行租赁和破产清算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国企改革涉及职工根本利益,且涉及社会稳定,因此,改革的阻力较大,尤其是业绩优良的国企明确反对民营化。对此,埃及在政府和股份公司两个层面形成了推动民营化的激励机制。激励政府的因素有减少国企债务,减轻财政负担。更重要的是,埃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推动的民营化改革,主要源于改革成本减少的激励。股份公司的激励在于1993年将企业民营化改革的选择权交给股份公司,它通过行使权力可获取一定的利益。此外,1994年,政府相关部门设定了国企经理工资的上限,这一制度措施减少了优良企业改革的阻力。<sup>④</sup>至2001年9月,实现民营化的埃及企业有184家。2001年以后,民营化改革停止,2003~2004财政年度只有9家企业实行了民营化。2004年7月,埃及新设立了投资部,成为民营化的主管部门。9月,该部发表了再次加速民营化改革的方针,调查了172家企业的财务状况,选为实行民营化的企业。然而,资金匮乏始终是制约埃及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弥补国内资本不足,1997年,埃及颁布了第8号法令,即吸引内外资的新投资法,制定了简化手续、减免税收及提供便利条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sup>⑤</sup>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埃及于2000年以第162号令、2004年以第13号令和2005年以第94号令对该

<sup>①</sup> 参见埃及驻日本大使馆网站刊文:《1980年以来的・エジプト最大憲法改革》(《1980年以来埃及最大规模的宪法改革》), <http://www.embassy-avenue.jp/egypt/index-j.htm>, 2008年2月5日。

<sup>④</sup> 参见[日本]土屋一樹:《エジプトの民营化の变化》(《埃及民营化激励机制的变革》),载《現代の中東》(《现代中东》)2002年总第32期,第12页。

<sup>⑤</sup> 参见王利平:《埃及经济改革的成就》载《国际资料信息》,1999年第7期,第26页。

法进行了修订。该法与公司法一起构成了埃及投资法律体系的主体,埃及投资法以鼓励和吸引投资为目标,与国家经济计划紧密结合,重视从整体上改善埃及的投资环境,对埃及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调整经济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2005年埃及修订《公司法》通过改革公司法制,确立了促进企业创业的制度架构,削减了公司设立时必要的费用和最低资本金,削减了不动产登记费用,缩短了办理进出口关税所需时间,大力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

在金融结构改革方面,政府同样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1)变革利率制度。1990年,埃及央行为了提高利率撤消了对利率上限的法律规制,实际利率由1991年6月的-3%上升到1992年末的8%。上调目的是促进海外劳务赚取的资金回流本国,消化财政赤字。埃及尽管撤消了利率上限,但金融制度仍受政府管制,并未完全对应全球化要求。(2)银行和保险部门实施民营化改革。2004年7月,埃及新设立的政府投资部发表了银行和保险公司民营化五年计划,提出合资银行实行完全民营化,国有小银行也要走民营化道路。(3)改革资本市场。1993年埃及设立了资本市场监督局,并减少资本市场交易的各种手续费。1996年,该局提出对金融部门的检查和会计原则适用国际标准,严格规制证券公司内部人交易。(4)设立鼓励创业的金融机构。1998年埃及在开罗地区建立扶贫银行,《扶贫银行法》规定贫困线以下的埃及人都可成为该行客户,可获得200~1500埃镑的贷款,以便开展小规模经营活动。在金融改革中,银行改革一直是埃及面临的难题。为壮大银行实力,2003年埃及出台了新银行法,将最低资本金由1亿埃镑提高到5亿埃镑。新政府于2004年9月下旬发表了银行改革战略,将6家小银行合并到4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求两年内国有银行出售持有的外国银行与合资银行的股票,几年后4家大商业银行至少1家以上实行民营化,还提出推动四大有商业银行的裁员减薪。<sup>1</sup>另外,埃及在央行设立专门机构,且设置金融问题专门裁定委员会来处理占贷款总额30%的不良债权。埃及政府希望根据2003年的新银行法,通过兼并和重组,培育出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现代商业银行。此外,新银

行法确立了埃及央行的独立性,对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出口贸易改革方面,埃及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1)2002年颁布经济特区法,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区,特区企业可享受优惠政策。如确定产品价格、出口产品不需获得许可证、投资企业按10%缴纳企业所得税,按5%缴纳个人所得税等。(2)颁布《出口促进法》2002年7月为促进进出口,缩减贸易逆差,埃及通过《出口促进法》,简化出口程序,规定优惠关税。2005年埃及又修订了1975年的《进出口法》,谋求扩大出口。(3)改革关税制度。政府根据2004年9月第200号总统令,将关税税率由14.6%降为9.1%,同时,简化关税手续。过去的关税税率和关税法规定的进口手续繁杂,成为关税当局渎职的诱因,<sup>④</sup>通过改革关税法,实现了进口手续的明确化。(4)积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在欧洲、中东、非洲的出口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埃及与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缔结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或特惠贸易协定。1999年加入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2004年6月对欧盟协定、2005年对大阿拉伯自由贸易区分别生效。2007年3月与土耳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需要指出,多年来,埃及已形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战略,即通过撤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激活国内产业,真正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多边贸易交涉,实现贸易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通过成为中东、地中海地区自由贸易的中枢,提高埃及作为投资地的魅力。<sup>⑤</sup>为实现这一战略,埃及与欧洲国家于2001年6月签署了埃及与欧盟协定,2004年1月关于贸易方面的规定生效。该协定包括保护幼稚产业和欧盟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埃及于1999年与美国签署了贸易投资框架协定,内容包括通关程序顺利化、民营化、知识产权、银

<sup>1</sup> See Sobhi Yasser "Banking on reform", *Al-Ahram Weekly*, September 2004 pp. 16-20.

<sup>④</sup> 参见[日本]土屋一樹:《最近の経済改革》(《埃及最近的经济改革》),载《現代の中東》(《现代中东》),2006年总第40期,第6页。

<sup>⑤</sup> 参见[日本]渡边松男:《H N FTAについて》(《埃及与自由贸易协定》),第3页。See <http://www.jia.or.jp/pdf/fia.pdf#search=FDA>, 2008年1月2日。

行改革等。2004年12月,美国、埃及、以色列三方签署了“合格工业区协定”(QIZ),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建立工业区,产品免税向美国市场出口。有学者分析,埃及如果与美国缔结商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埃及的工业化将取得进展,出口竞争力也将大为增强,会产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近2%的效果。<sup>1</sup>

## 埃及式的法制仍需完善

纳齐夫上台后,利用组阁之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胆任用14名年轻的新部长,合并贸易部和产业部,新设贸易产业部,设立投资部。贸易产业部、投资部、财政部3位部长均为改革派,<sup>④</sup>这对推进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埃及政府还及时简化繁杂的行政手续,扩大对投资者的服务,提供投资信息,重新审视政府保有的资产,对国债实行有效管理。这些举措为宏观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受制度惯性影响,埃及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现象还十分严重,它制约了该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制度上建构制约官僚主义的机制,尤其是颁布彰显市场机理的公务员法,对埃及来说更为重要。

财政赤字一直是困扰埃及财政体制的毒瘤,急需解决。迄今,埃及财政赤字未见明显改善。在财政收支方面,社会保障费、公共部门人事费和国内债务的利息支付造成了较大的财政压力。2000年以来,埃及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因此,补助金制度改革便成为削减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在2004~2005财政年度预算中,粮食、公交、医疗、房贷等直接补助金为156亿埃镑,没有列入预算项目的石油和教育的间接补助金为630亿埃镑。<sup>⑤</sup>纳齐夫政府在2004年9月以后,对若干品目的补助金实施削减。尤需指出,补助金制度改革对埃及市场经济来说意义重大,它既是向市场转换的需要,同时也是财政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今后,如何通过财政法,变革财政体制,也是埃及急需解决的课题。

埃及现在正处于过渡期,面临如何解决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从建构市场经济体制角度看,司法体制是最后一道屏障,是经济体制运作的保

障。司法体制若能运行顺畅,所有的经济纠纷就能在司法制度框架内解决,对金融体制、行政体制、贸易体制也将起到良性互动作用,可维持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率与公平。虽然埃及于2005年提出完善司法独立、开发司法制度等理念,但真正建构既符合市场机理又符合埃及国情的司法制度,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探索,需要修改《民事诉讼法》等许多法律。

在经济结构改革方面,埃及需要进一步改革健康保险制度、年金制度、医疗制度、不动产税制等。运输、能源、教育等领域也遵循市场原理,需要出台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调整,使改革能够有法可依,有序推进,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由此,今后若干年埃及仍需加强立法建设,大力推行各项改革,促进社会进步。

我们应当肯定,埃及经济改革中的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如采取渐进的制度改革方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择机推进改革;注重发挥法律的工具作用依法改革;注重立法与社会经济实情相一致;修改宪法,为改革创造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中注意维护社会稳定;大胆起用改革的中坚力量;扭转制度路径依赖;注重形成推动改革的激励机制;努力形成利于创业的法制环境等。这些做法对处于制度转型的有关发展中国家来说,确实值得认真思考。当然,埃及毕竟处于改革过渡期,或者说处于打造现代埃及的关键期,很多支撑市场运作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发掘和完善,最终能否形成真正的制度模式,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邢永平)

<sup>1</sup> [日本]内田正義:《「FTA」米国のFTAおよびQIZ》(《埃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合格工业区协定》),载山田俊一:《開発戦略と地域経済統合——中東・北非中心——》(《开发战略与地区经济合作——以埃及为中心》),亚洲经济研究所,2005年3月,第87页。

<sup>④</sup> See El-Din, Gamal Essam and Dina Ezzi, “Testing the waters”, *Al-Ahram Weekly*, July 2004, pp. 15–21.

<sup>⑤</sup> El-Fiqi Mona, “Restructuring subsidies”, *Al-Ahram Weekly*, April 2005, pp. 21–27.